

公民视点

肇事司机领红包



10月28日,浙江宁波的张女士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交警部门的,向她核实几天前一次刮擦的具体情况和赔偿金额。原来,10月25日,张女士在驾驶途中开错道,正要变道时,跟一辆直行车撞上了。由于正值早高峰,过错方又很明晰,张女士与受损车主决定私了此事。按对方提议,张女士付给了对方1000元赔偿费。

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还会接到交警的电话,张女士心中有点犯嘀咕。交警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她摸不着头脑,“受损方要把多余的赔偿费退给你,我组个微信群,你领一下红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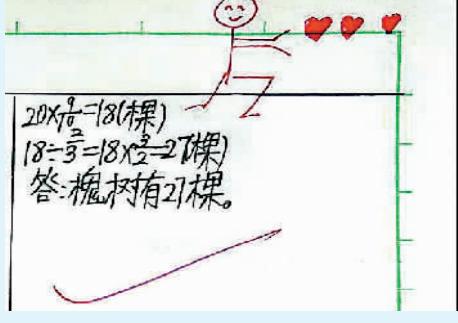
原来,事故发生当天下午,受损方王先生去修车,修理店工作人员表示,车损不大,修车费500元就够了。“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王先生心里不踏实了。由于没有留下张女士的任何信息,他只能报警,最终通过交警协助找到了张女士。

“修车费给了多了要退还,我之前还没碰到过。”就像经办此事的交警所言,这不是一件大事,但又是一件值得说道说道的事:费尽周折要钱的见了不少,几经周折要退钱的就很罕见了。

据张女士表示,刚入群时,她和周围的同事都担心这是新型诈骗或会遇到手机病毒。在骗局层出不穷的当下,这样的反应,既真实又可以理解。也因此,当500元真入账,张女士所有的怀疑和警惕一下子变成了感动,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俗话说,破坏信任容易建立信任难。这话对也不对,可以大胆判断,在张女士心中,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因为这500元,一定能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花式作业批改法



最近,厦门一群小学老师因为用个性化方式批改作业,不仅受到学生、家长的喜爱,连围观网友也感叹:看完自己都想写作业。

这些老师中,有的在作业本上手画表情:作业完成得好的,画一个发射爱心的小人;略有瑕疵的,画个跳舞的小人皮一下,再加个“加油”来鼓励。也有的老师网购各种印章,在批改完作业后根据情况来“盖章”:有的是竖得高高的大拇指,有的是露出牙齿的笑容,还有的是用花式字体写成的“有进步”。

还有一位老师,从4年前就让班上的同学合写日记。据她介绍,四五名同学为一组,轮流在同一个本子上写,老师会批改,其他同学也可以“跟帖”或“回复”。据这位老师介绍,她会在日记中和学生平等对话,学生都很期待看到她的评语和别人的“跟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写作也有促进作用。

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老师在他们心中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作业本上的一句评语、课堂上的一句赞扬,往往会对他们产生不小的影响。厦门这些小学老师的花式作业批改法,既让老师们在这个流行表情包的时代与时俱进,拉近了与10后学生之间的距离,又十分形象地表现出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的心情,这显然比简单给个分数或者给个ABC等级要有意思得多。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盖章还是画表情,都能让鼓励肯定变得更温暖,让批评教育变得更委婉。要知道,只有老师“走心”批改了,学生才会“入脑入心”,并最终实现让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鸵驼)

辽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本报讯(记者刘旭)近日,辽宁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十部门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各地要采取加大投入、工作试点、业务培训等方式,推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不断改善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对参与此项工作的社会力量,各地政府将以购买等形式给予鼓励与支持。

《实施意见》明确,推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转型升级,健全服务功能,规范工作流程,提升关爱服务能力。各地要优化儿童福利机构区域布局,推动将孤儿数量少、机构设施差、专业力量弱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向地市级儿童福利机构移交。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分层级、多样化、可操作、全覆盖”的要求组织开展儿童工作业务骨干以及师资培训。要建立和完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跟踪机制。

《实施意见》明确,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各地民政部门及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通过政府委托、项目合作、重点推荐、孵化扶持等方式,积极培育儿童服务类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要支持相关社会组织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服务能力提升,提高关爱保护服务水平。要在场地提供、水电优惠、食宿保障、开通未成年人保护专线电话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各地要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结合实际做好资金保障,重点购买走访核查、热线运行、监护评估等关爱服务。

公民道德

在摆满乐器、音响的治疗室里,旋律和歌曲让病人恢复语言能力,也帮助他们重新拾起尊严和信心——

有一剂良药, 名叫音乐

本报记者 吴丽蓉

“我哼旋律,你想想这首歌叫什么。”宋宜川说完,就抱着吉他轻声弹唱起来,“……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在他对面,小韩努力想了好一会儿,最终只模糊地说出一句话,“不记得了。”

在宋宜川和小韩周围,摆着电子琴、架子鼓、音响、话筒……如果不是因为宋宜川穿着白色大褂,初来的人准会以为这就是一间音乐教室。

实际上,这里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音乐治疗室。来这里治疗的病人,大多因脑血管疾病或脊椎受损影响了语言能力。在治疗师宋宜川和他的同事的帮助下,这些病人尝试借助音乐恢复原有的音色和气息。

“2岁前,我没想到自己会从事这样的工作。”和进出治疗室的病人一样,宋宜川也要依靠轮椅来“走动”。12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胸部以下全部瘫痪,也断送了这位当时还在音乐学院上大三的年轻人当歌手的理想。

“他们正在经历的,我都经历过。”宋宜川说,每一位患者,在自己眼里都是一个战友。靠着音乐,宋宜川治愈了自己,并在治疗更多与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

用唱歌来重新学会说话

这是29岁的小韩到音乐治疗室上的第一节音乐课。去年,因为高血压引起脑内出血,小韩记忆受损,语言能力也出现障碍。在给他做康复治疗的医生的推荐下,他出现在宋宜川面前。

像小韩这样,生病后不记得曾经能随口哼唱的音乐的患者并不少见。宋宜川很有耐心,他又继续唱了几段并不断给出提示,慢慢地,小韩偶尔也能跟着他唱出几句歌词。终于,发音不算清晰的“《成都》”从小韩嘴里蹦了出来,宋宜川立即朝他竖起大拇指,还为他鼓了掌。

一节课下来,宋宜川带着小韩唱了《七子之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大约在冬季》等十几首歌,大多

是小韩这个年龄段的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宋宜川告诉宋宜川,自己原来就很喜欢听歌,不过唱得不好。“上课的感觉很不错!”离开前,他已经期待着第二天再来治疗室。

这家音乐治疗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全国首家三甲医院的音乐治疗临床科室。治疗中心负责人张晓颖告诉记者,来这里的病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脑出血、脑梗、脑外伤等导致的脑血管病患者,一类是颈椎、胸椎、腰椎等受损的脊髓损伤患者。简单来说,采取音乐治疗时,前者要针对大脑皮层不同分区做针对性训练;后者则要通过练习恢复病人的膈肌、双肺的功能。“方法不同,但都有科学理论做依据。”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音乐学院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与治疗中心的同事相比,宋宜川显得比较特殊,因为他治疗的第一个病人是自己。

治愈自己 治疗别人

宋宜川从小喜欢音乐,为此他从安徽老家到北京上艺校、考大学。大学期间,他接受专业训练,课余时间也参加演出,到酒吧驻唱,梦想越来越清晰。直到2007年,他失足从高层跌落。

宋宜川胸部以下全部瘫痪了。

由于大半个身体都失去了感知力和运动功能,刚受伤那会儿,宋宜川不仅说话时气息严重不足,连气管中积累的痰液也无法自主咳出。康复治疗时,主治大夫给了他一个呼吸训练器,要求把里面的3个小球吹起来。尝试了好几天,他都无法完成。那段时间,宋宜川觉得自己大概只能回老家开个小卖部度过余生了。

谁也没想到,带来希望的,竟是以为再也不会碰触到的音乐。宋宜川发现,要把呼吸训练器里的小球吹起来,和上学时练习声乐要训练呼吸发力点的原理是一样的,都需要依靠膈肌力量来支撑。

于是,躺在病床上,他“重操”起了老本行。效果很明显,与同期病友相比,他恢复得更快,一年后,他就又能唱歌了。2008年,他参加了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让他意识到,即使做不了专业歌手,他还能留在北京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

“我的工作就像是健身房教练,练不同的部位要用不同的方法。”宋宜川说,有的患者需要唱歌,

随后几年,宋宜川自己创作歌曲,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还创办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并以此谋生。渐渐地,他的经历传开了。2013年,一位母亲带着自己高位截瘫的儿子找到他,请求他帮助孩子恢复说话的力气。

听见轮椅上的男孩说话时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和几年前的自己一模一样,宋宜川同意了。他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给男孩制定了呼吸训练方案,还经常带着他练歌。2014年,在一场比赛演出上,这个一年前甚至不能把一句话完整说出来的男孩,在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快节奏的歌曲《快乐崇拜》。

自那以后,更多的患者找到宋宜川,在他在小小的音乐工作室里重新学会说话和唱歌。3年前,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音乐治疗中心成立,宋宜川投出简历,正式成为一名音乐治疗师。

把治疗室当舞台

在治疗室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那是一个叫吴美丽的患者送给我的。”宋宜川说,相比真名,他更愿意用“美丽”来称呼那个女孩。

去年,26岁的吴美丽因遭遇车祸受到严重脑外伤,整整昏迷了5个月。醒来后,她的言语和认知问题不大,但手术损伤了她的声带,她不仅说话声音很小,音色听起来还像个老年人。

初来音乐治疗室时,吴美丽处于情绪低落时期,很长时间都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你不是来看病的,你是来提升气质的。”宋宜川这么对她说。

相对于这些病人经历过的抢救生命的药物治疗,包括音乐治疗在内的康复治疗周期更长,见效也更缓慢,大部分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患者病情、心态会有起伏变化,治疗师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来应对。

“我的工作就像是健身房教练,练不同的部位要用不同的方法。”宋宜川说,有的患者需要唱歌,



10月29日,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音乐治疗室,宋宜川在给患者上音乐治疗小组课。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有的患者需要朗诵,而根据患者基础与病情不同,歌曲和诗歌的选择也都有讲究。

吴美丽此前有一定音乐基础,再加上自己努力训练,到今年上半年,她的声带已基本恢复。端午节时,宋宜川带她去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两人合录了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

吴美丽的声带恢复了年轻活力,她也顺利出院,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因为相似的经历,在宋宜川眼里,每一位患者都是他的战友,“每有一位战友通过音乐治疗重拾了尊严和信心,我就觉得自己的价值也得到了实现。”

目前,经宋宜川治疗恢复的患者已有50多位,但与等待治疗的人数相比,这还是太少了。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张晓颖说,音乐治疗法上世纪中叶建立学科,需要具备音乐、医学、心理学等理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由于从业人数少,音乐治疗在国内的普及率还很低。

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治疗师,这是34岁的宋宜川现在的目标。他说,不管多疲惫,只要音乐治疗课一开始,他马上就能精神抖擞,“就像过去只要舞台上灯光亮起,我就能拿起话筒开始演唱一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美丽为化名)



共享单车的 “锦衣卫”

今年41岁的赵军在西安做共享单车运维员,主要工作是摆渡投放共享单车以及给共享单车剪私锁。3年来,他已剪锁近3万把。他说,想把这些锁卖了,捐给贫困地区小孩。在网上,大家亲切地把他称为共享单车的“锦衣卫”。
陈飞波 摄/东方IC

南昌利用监控曝光车窗抛物行为

本报讯(记者卢翔)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城管部门曝光了一份“黑名单”,名单为30名从车窗抛物的车主。“黑名单”上,数量最多的是私家车,其次是出租车,还有少部分是企事业单位车辆。下一步,这些车主将受到处罚。

近日,南昌城管、交管部门联合开展车窗乱抛、非机动车乱停放不文明现象整治行动。两部门加强了资源和信息共享,利用双方监控平台对车窗乱抛行为进行抓拍,发现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后,由城管部门将违法信息传递给交管部门实施处罚。截至目前,通过监控系统和市民举报,南昌共拍摄到车窗抛物素材百余条,经交管部门核实时有效案件共42起。

据悉,两部门还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全市“车窗乱抛、非机动车乱停放”联合执法整治行动方案》,提出组织各县区执法大队、交警大队每周开展不少于两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对非机动车占人行道、人行道乱停乱放、机动车占人行道、绿化带乱停放等行为,采取行政罚款、拖移等措施。

父亲偏瘫在床,工作少他不可 “我要尽孝,也要敬业”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徐晨

常杰的一天,说不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时候是中午——“天窗”点工作往往在凌晨4点结束,他睡三四个小时就要从南京南站赶回家为父亲做午饭;有时候是早上——刚下“天窗”,邻居就打电话,父亲又尿床了。

从去年9月父亲常朝祥因重度脑梗塞落下半身瘫痪的后遗症后,常杰就过上了两头跑的生活。

常杰是独子,很少时候母亲离家出走,是父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父亲生病后,为了时刻照顾好父亲,他在手机上设置了许多闹钟,有“吃药”“按摩”“睡觉”等等。“工作一忙就容易忘事,设置闹钟能起到提醒作用。”刚过四十的常杰身形消瘦,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常杰确实很忙。他是南昌高铁电力工区的汽车驾驶员,也是工区唯一的驾驶员。铁路供电工作点多线长,工区既要白天干活,还经常要安排夜间“天窗”。最多的时候,常杰一周要连续上四个“天窗点”。

有一次,工区利用“天窗”在江浦站进行箱变电缆割接,当做最后一根电缆时,工长卢彬发现车上带的电缆头都用完了,“当时是夜里2点半,如果完不成就要向路局申请延点。”见状,常杰以最快速度在一小时内往返于江浦站和南京南站,协助卢彬等人在“天窗点”结束前15分钟完成了全部工作。

据车间主任戴韵介绍,常杰担任驾驶员以来,行车一直都是零违章事故。“每有特情,他都能冷静准确地处置;每有新的专业知识,他总是首批学习。不知情的同事根本看不出他还承担着家庭的重任。”

“天窗”工作结束,早上10点,常杰又得买菜做饭,张罗父亲的午饭。一年多来,他还摸索出了一套健康餐谱。“老人把我养大,工作让我自立,”常杰一边忙乎着一边说:“我要尽孝,也要敬业。”

河南一农民工突发疾病离世,八旬父母及亲属同意捐献其5处器官

离开时,让生命延长5倍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胡俞淇

近日,在浙江省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里,有两副眼角膜正在等待合适的受捐者。眼角膜的主人,是来自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安岭镇观音村的农民工郭书宝。10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夺去了他43岁的生命。悲痛之余,郭书宝的八旬父母和其他亲属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捐出郭书宝的5处器官。

“他是个能干、坚强的人,就是命苦了些。”在淮阳老家,说起郭书宝,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年少时,郭书宝在一次意外中摔伤了右腿,由于当时家境贫寒延误了治疗,最终截肢落下残疾。

成年后,郭书宝与一位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女子结婚,育有一女一儿。他去世时,女儿正在上高中,儿子还在村里念小学。尽管是村里

的低保户,但郭书宝从不等靠要,他自学了理发技术,此前十多年,一直靠在村里经营理发店维持家里的生计。

两年前,眼看孩子越来越大,为了多挣钱给他们创造更好的上学条件,郭书宝不顾自身的残疾,跟随大哥郭书艺远赴浙江乐清打工。“弟弟在这边生活很节约,每月发工资后,除了留下必需的花销,剩下的钱都及时转回了家里。”郭书艺说。

然而,半个多月前,郭书宝在餐桌上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随后被诊断为小脑脑干大面积出血。尽管经一夜抢救,他依然无法自主呼吸,被宣布为脑死死亡。

由于郭书宝的情况符合器官捐献条件,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ICU主任郑友文找到郭书艺,建议他捐献弟弟有用的器官。

在此之前,无论是郭书艺还是他身在老家的父母,谁都没听说过器官捐献,“弟弟不在了,但他的生命能在别人身上延续,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念想。”郭书艺表示。

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让他们悲痛欲绝,更何况,对农村老人来说,让逝者完整地入土是根深蒂固的思想。因此,要做出捐献的决定对他们来说绝非易事。

最终说动老人的,是器官捐献的意义。“当他们听医生说捐出的器官能挽救别人的生命后,默点了头。”

10月15日,身在淮阳老家的郭书宝父母在委托书上按下了手印;随即,在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器官摘取手术也得以展开。郭书宝离世的当天晚上,他的一副肝脏和两副肾脏就被成功移植到3名重症患者身上,让久病之人看到了治愈的曙光。据郑友文介绍,只要找到合适的受捐者,医院会尽快让郭书宝的眼角膜“重见光明”。

</